

道德、历史与选择

——传统历史心态与思想界的使命

李 晓 明

坦诚地说,无论人们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理解是多么直观和粗疏,对它们进行讨论的主要目的却显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对社会历史心态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了各种政治幻梦和蛊惑人心的口号的褪色剂,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对这场讨论倾注着一种摆脱经济崩溃和节衣缩食困扰的变革躁动。缺憾的是,那次讨论未及清理民族的价值意识,未及诊治由精神创伤所致的思想苍白,人们已被改革和开放的浪潮挟持疾进了。只是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深化改革的受阻,随着生活结构的变动和人际关系的重新组合,人们才渐渐意识到社会各阶层对历史进步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明显的分化和游离;传统的历史心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冲击。每个人都身临相同的处境——对价值尺度的重新思考和选择。这就是今天生产力标准讨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中国的困惑

在人类历史上,十年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十年间中国人历史心态的潜移默化却有改弦易辙之势。现实的功利日趋取代抽象的原则,成为了人们评判社会行为或诠释历史心理性的出发点。这严重危及了以道德人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传统历史观。被物价和通货膨胀搅得心烦意乱的国人,又加上了对“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焦虑:中国将被引向何方?是历史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堕落和虚无?于是有人把坚固和宏扬伦理至上的传统文化视为现代的道德方舟,祈望它能将中国从五光十色的物质文明洪荒中拯救出来。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在缺乏理论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和现代化的憧憬,成为了民族时代精神的认同标志。它们凝聚着浩劫之后民族的集体情感,但其本身又是求均求安群体心态和历史价值意识的同化物。大多数的中国人欢迎改革向往现代化,但不愿冒风险和缺乏代价意识。天津的一次社会心理调查表明,65%的人对优胜劣汰持有异议,75%的人信守知足者常乐,大多数人赞成上不封顶但反对下不保底。“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没有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新教伦理精神,没有美国人开发西部的坚韧和狂热,也没有日本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时期举国上下“卧薪尝胆”的代价意识,中国人是以一种宁静和平稳的心境恭候改

革成功各得其所，现代化如期而至的。他们确实穷怕了向往着现代生活丰裕的物质消费，却对现代社会运行和制约机制的确立毫无准备；他们期待商品经济能有效满足增长着的社会需求，却不曾思考其竞争法则和新的价值尺度将把每个人卷入利益的漩涡；他们衷心接受理性的启蒙和个人权益的高扬，却未曾料及人际关系传统格局破缺所带来的冲击，未曾寻求和确立新的生存意识和责任感。一场充满阵痛的变革，被传统的历史心态图解成现代乌托邦的漫画。然而这幅漫画却像皇帝的新衣一样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因而，步履蹒跚的商品经济和初露端倪的竞争机制，在许多人心目中变成了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六亲不认的怪物。从市民到教授都开始眷恋起“造神时代”甚至更遥远的年代的好处来了。我们的民族毕竟安时顺世和守道安贫惯了。这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困惑。

中国是一个盛产农业乌托邦的国度，从孟子的井田制到王莽的王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从老子“小国寡民”的极乐世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梦幻支撑和牵引着民族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并有着与西方近现代乌托邦理论迥然相异的特征。其一，中国式乌托邦靠小生产强烈的平均意识来衬砌，其旨趣在于将社会引向物质和精神的平均分配和占有。其二，它的理论架构的基本取向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因此，各种乌托邦的思想原型都可以在《礼记》《周礼》中找到。作为一种简单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蒸发物，必定具有保守倾向和惰性特征。其三，中国式乌托邦不是纯粹的关于彼岸世界的镌刻，而往往是强制建立的“现实”。此岸与彼岸世界的糅合，超越性理想与现实控制模式的同一，使人在激情中就接受了某种现实（如人民公社）。其四，中国式乌托邦具有“以德为本”的强烈的伦理化倾向。其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理想化”多是空泛笼统的。并且它展示的不是新文明中的新道德要求，而是先人在农业文明中提出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器惟求新，人惟求旧”牵引新文明沿着传统理想的轨道前进。总之，乌托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缓解现实与理想撞击所产生的社会性紧张心态，慰藉不合理现实与合理需求之间冲突的重要功能。它使人人面对历史变迁时总是从容不迫翘首望天，指待奇迹的出现。它铸造的是吞噬个体竞争选择机能的麻木生存意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关于改革的乌托邦图解与西方感性文化的输入、社会过热的物质消费追求以及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错位的文化认同”。这种错位的文化认同使中国流行“改革综合症”；还未奉献就急于索取；还未参与竞争就放弃选择；还未提高生产效益就热衷于趋前消费；还未跨入现代物质文明的门槛就东施效颦地发出饱受科学和物质文明“压抑”的痛苦呻吟。这一切既引起卫道弘祖者的惊恐，又引起了改革者们的困惑。他们相互指责，却都未曾意识到这是传统心态中的生存意识与特定时代环境的混血儿。

对改革的乌托邦图解，只是传统历史心态表层结构的一种解释和规范功能。它受制于历史心态的深层结构——价值选择机制。堪称“礼义之邦”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把道德视为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实在，即特殊的人文传统和历史意识的本体，是唯一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历史观、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统一起来的价值范畴。在其文化价值选择机制中，历史与道德是等价的，不存在着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分立和张力。这种道德意识不是以社会的公平为基础，而是以“礼”为核心，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名分和等级制度为制约内容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各种道德训戒既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又有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它不是纯人伦关系的规范，而是各个历史时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总结。孔子承周礼之统绪，由亲亲而言仁，由尊尊而言义，通过正名分来固定君臣父子的隶属依附关系；通过

礼制、礼教、礼律和礼治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天人合一的论证，把天道道德化，再用道德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间的世俗道德，使后者获得超越性和支配的威严；另一方面又通过对道德价值的极端扩张，泯灭种种人欲的合理性，把人的价值选择唯一化即无选择化，从而使每个人在道德的自我净化之中，自我剥夺，自我压抑，成为无欲无求安于现状的道德工具。通过对人进取性的自戕来弥消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人仍然执著地用道德这把尺子来评判和理解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撞击。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奇技淫巧，使多数中国人接受了人类物质文明的中心已不在中国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自信，作为道德大国的中国仍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中心。“道德至上”成为了满足国人文化虚荣心，抗御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后心理壁垒。不幸的是由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和开放，昔日裁度别人的尺子终于必须用来裁度自己了。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表明，人们担忧着公民道德素质的恶化；一场“蛇口风波”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其实人们早就不在乎论争的双方是怎么说的了，而是在倾注对道德现状的关切。有的人呼号强固优良道德传统抵御西方瘟疫。有的人急急忙忙主张建立新道德去取代旧道德。却极少人去重申道德在现代文明价值取向中的客观位置，理解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实际作用。

道德是人与动物之间的重要分界，但我们的贤哲却把它视为唯一的分界和分离手段。^①这不是抬高了人而是扭曲了人。人是从野兽开始的，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何况道德是具体历史的范畴，它与人类文明演进中其它价值取向的关系也是具体和历史的。在文明的蒙昧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极为简单。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关系都从属于血缘宗法关系。血缘宗法关系成为了社会总体关系协调和维系的轴心。因此，通过道德及其尺度来协调社会价值取向，制约各种社会行为，以解除无法律或法律不健全状态中的社会秩序危机，显然颇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这是传统历史心态和道德史观生成的文明背景。但它又以两方面的代价为前提。一方面它以人的片面性为代价，有天理无人欲后入道德，存在于多种多层社会关系之中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就被挤压成道德标本了。人不是道德的主体而是道德自我完成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以道德的虚伪化为代价。“道德至上”必以强制方式去压抑和剥夺人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意志的他律是一切假的道德原则的来源。”^②在我们民族的伦理实践中，最重道德的人往往是最不道德的人，最拱卫人伦风化的年代总是社会风气最为败坏的年代！这种道德信念与实践的悖悖根源在于文化运行机制。因为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解除道德压抑的有效方法，就是在自身的生存现实中游离道德的信念和实践，把道德约束限制在异己制约的效力范围之内。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道德自我净化运动愈演愈烈，形式是越来越完整，但社会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变得越来越虚伪。这本身就是“道德立国”论的破产。当然，在几千年历史中也不乏在道德自我净化中被神化的人物。但其执著的道德修炼总是由实而虚，并必定以牺牲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其道德生活遭遇只能隶属于整个民族宏大的造神运动。对个人来说，这是人生的悲剧，而对社会而言，则成为历史的闹剧。

当前，不少有识之士指出道德格局的紊乱甚至退化，急待因势利导确立新的道德规范和制约机制。这自然切中事理。但是，如果不清除中国人历史心态中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模式，不能科学地重建社会和个体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那么寻求现代人合理道德规范的努力就有如瞎子摸象。并且建立起来的新道德规范也难逃被漫画化的厄运。相反，只有通过道德伊甸园废墟的清理，我们才能在坚实的文明大地上奠立起时代的道德。

二、项 链 与 枷 锁

中国的文化结构自古以来有着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无疑其中“道德至上”的历史心态具有强大的定势作用。这一特征对中国今日的改革和开放有何影响?新旧道德规范不假思索地转换,道德生活中过重的心理负荷,使西方人带着道德焦虑症来中国寻找道德最后的净土,为其超越历史的道德理想寻求文化的归宿。但他们对中国的道德生活的亲身体验,往往使他们在失望中作出了矛盾的结论,有人呼吁中国人要抵御西方文明的污染,维护自己朴质文化的道德水准;有人则认为这是东方社会中个人缺乏权利和责任感所导致的道德虚伪,它比西方的道德现状更要落后。同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瞩目,东亚汉字文化圈经济的崛起和新儒家思潮的泛起,也诱生了中国人发掘国粹以道德为本复兴民族的冲动。道德立国成为了民族美轮美奂的文化项链,人们越来越虔诚地相信“文明演进的循环论”——未来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光必定在中国。这种盲目的历史心态,使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往往失去了现实的态度和自新图强的坚韧精神。

人类历史心态的演化大体可分为道德史观、经济史观和文化系统史观三种主要形态。其中道德史观持续最长、渗透力最强、对各民族的中低文化层的影响也最大。道德史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的伦理活动(包括信念与行为)及其演化,看作是历史的基本价值选择和终极目的;从人性(善或恶)和人伦关系出发,引申出社会的各种制约机制和控制系统;并据此解释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发展动力,评估和论证文化价值的合理性选择。它适应于社会活动和关系较为简单的文明状态。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溯源,都可以发现其运行的轨迹。在西方,血缘宗法的道德伦理史观最初演进为古希腊素朴的理性主义形态(因为希腊人对公共道德的思考不仅产生于对人伦关系的制约,而且出自于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亚里士多德“理智及美德”的信念体现出其理性主义的倾向),中世纪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形态(基督教文化把历史理解为通过人生赎罪修行而达到终极的道德目的,历史事件和人成为上帝的道德训示工具)和近代理性启蒙主义的形态(即把历史理解为人性的失落与复归的运动,是一种人类理性的迷误和觉醒的过程)。虽然,三者人类心理发生上各有先后、此起彼伏。但它们是相映相生、交叉重叠,并不存在截然取代的关系,而后者则往往整合着前者的某些思想和要素。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严酷和尖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资本和商品经济摧毁了田园诗般的血缘宗法王国:用赤裸裸、直接的经济制约取代了神圣而虚伪的伦理道德制约;道德理性、宗教虔诚和小市民尊严通通被淹没在金钱关系的冰水中。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重新把握自己真实的社会存在,评估和理解人生的价值选择和历史变迁的合理性。人心中的以道德评判、赏善罚恶为基调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幅“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历史图景。经济史观抓住了近代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和运行机制,并试图推导出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求解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人类历史心态的重大变革和进步。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仅用经济矛盾运动来解释博大的社会现象和各种社会形态有许多困难。因此,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结构发育的日臻成熟,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理论则越来越倾向于把一个时代的文明和社会生活看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侧重从这个系统及其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来把握历史的总体,阐释社会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选择和制约的机制,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合理性作出立体性的评估。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行程,几乎是以简缩的方式再现

了人类历史心态演化的总程序。他们晚年对人类学的重视和探讨,显然不能仅理解为对先前思想的补充。有趣的是,中国思想界的视野近十年来大体上也以简缩的方式,经历了人道主义启蒙——经济决定论——文化整体反思的演化。这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思想解放运动颇有启迪。

华夏民族的历史心态由于受早熟的农业文明的制约,呈现出独具的发育特征。人所共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繁荣与地中海商业、城邦和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紧密相联。它们使希腊人素朴理性主义的道德史观在扬弃血缘宗法色彩,建立法制传统和意识方面颇有建树。相反,中国则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不充分,民族精神生活中神秘的集体表象,则直接转化和升华为血缘宗法化的伦理世界观,并人格化为君权神授、天命神权的信条。阴阳、儒、道、法诸子百家争鸣的初衷,都是为了谋求建构天人混一,以天道论证人伦公道的超越历史时空的价值思想体系,从而引导社会制约机制的建立。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制体现的不是法治意识,而是由祭祖仪式的“礼”演化而来的,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人伦规范的“人治”意识。这种意识经由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的阐发和升华,日渐构成了比法律更具约束力的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和社会制约机制。它们极适应于农业文明封闭和简单的社会结构,有效地协调各种名分等级之间的冲突,有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静态平衡和群体的稳定和谐。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发展节奏来说,只要社会稳定了生产发展的效益就自发解决了,社会就出现“太平盛世”。因此它们无愧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项链。同时,这种机制又以压抑农业文明内部滋生的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和力量,攘除导致社会结构不平衡的新文明要素为前提。它扼制了社会激活机能的生成发育,使社会运转的能量摄取主要依赖于封闭结构中的“内耗”。因此,文明越进步、异质文化的撞击越激烈,其文化势能衰竭症状就明显,最终将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桎梏。这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这种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以传统的道德规范来图解历史。用狭隘和天然的人伦关系来限制其它社会关系的生成发展,这必然剥夺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种文化价值选择机制以单一和重复的东西——即被政治化的先人道德为参照系,使民族文化发展的其它价值取向变成了血缘宗法和名分等级制度祭坛上的牺牲。君主必须“以德配天”。百姓则由敬祖孝父到忠君报国。“民反德为乱”,先人的道德法度成为良民与乱民的分界。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敢于抨击君主制度,但对维系这个制度的血缘孝宗的精神纲伦却敬若神明。在一个认识只对道德负责,行为仅以道德为界,一切以道德为公分母而建构起来的社会中,血肉丰满的文明之躯只能被挤压成抽象干瘪的伦理骷髅。历史进步的活力又从何谈起?有曰,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或许这不是对历史变迁充分的脚注,却是对道德史观绝妙的揶揄。可悲的是,直至今天“道德万能”论还被当作消除社会变革中各种震荡的秘方——从官僚主义到行贿,从金钱拜物教到权力拜物教,这究竟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还是出于对祖传家珍的狂迷?

其次,道德一元的文化运行机制虽然有很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但它须以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屈从,以人际间的依附关系为先决条件,它的价值假定是个体必须与群体协调一致。个体除了对群体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绝对认同之外,没有任何现实的个性存在。个体只能以思维的至上性来回避现实的真实性和自我的虚无来补偿自我的渺小(如庄老禅学)。在这种文化运行机制中,群体内部禁止公开竞争却充斥着以各种堂而皇之名目出现的忌妒、攀比和内耗,施行着以各种群体名义进行的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个人的人生价值被抽象地概括为“奉献”,至于奉献什么?奉献给谁?为什么奉献?则由居权者和权威们任意罗织、裁

定和发挥,有如从古代的忠君意识到现代的“为政治路线而献身”等等。其后果有三。第一,强化了对权力的觊觎和追逐。因为个人进入权力圈就意味着获得了以群体名义支配其他个体的绝对权力,以保有自己个性的存在。道德理想中的“圣者王”在实际上只能是“王者圣”。第二,由于道德责任和义务不是来自个体内在的信念和权利选择,而是他律约束的结果,芸芸众生不可能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群体至上的道德国度里却是公德心和公益心的普遍麻木。第三,个体的依附意识还剥夺了其对社会变革的风险承受力和生存竞争的选择能力。中国任何较彻底的社会变革,首先要招架的是几亿人嗷嗷待哺的依附心理。所以,中国改革多以流产或折衷而告终,守旧势力则因能迎合公众的依附心理而如鱼得水。今日中国改革中社会生活的困扰,较日本战后复兴时期“剥笋式”的生活相差好大一截,但全国上下齐唤受不了。不幸的是,不愿付出代价的结果可能是付出双重的代价。

其三,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把人格进取归咎为片面的道德修炼,必使民族的大量人才和精英蜕变为道德工具。礼教纲常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行为规范而且是人生价值的最终归宿。历代的社会精英几乎都把道德修炼作为人格自我完善的唯一途径。如岳飞、武训、雷锋等人在道德修炼上都达到极高水准。但其人生价值尺度却仍停留在寻找归属感的层次,各自都带有不同时代色彩的忠君意识。道德至上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还锻造出一种以人际关系的融合为基本尺度的人才和能力的评鉴模式。受重用之才往往是循规蹈矩,善从善处,老于世故的小才小技者。而锋芒毕露的大智大勇者大多被打入冷宫。“任人唯贤”经由道德一元的价值诠释必然是“任人唯亲”,德育第一实质上是人际关系第一。加上政治仕途的强化激励,竭忠尽智的谦谦君子大多自然成为了官场中能“谄”善“媚”者。这正是中国今日政治体制改革中巨大的文化心态障碍。

其四,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机制堵塞了道德现代化的道路,是民族道德危机的最重要的文化根源。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的合理性根据从来就是历史和具体的。传统道德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和等级服从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道德是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它拒斥强制服从和膜拜认同,而依靠对等约束来维系。两者之间基本成份的不可通约,决定了道德进步中存在着痛苦的“基础移置”。但传统道德的认同栅栏一方面极力排斥异质的道德新要素,另一方面又以传统历史心态为载体,惯性滑入现代社会生活。如果说它在传统社会塑造的是奸雄道德与侏儒道德,那么它在今天的中国只会炮制道德巨人(包括某些神造的巨人)与市井之徒。当今的社会道德困惑,与其说是人的道德沦丧,毋宁说是旧道德在新文明中的畸变膨胀。昔日被虚伪掩饰着的道德陈腐,在放松群体对个体强制的新文明中立即催化为道德恶臭。问题不在于新道德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而是人们既未找到新道德的生长点,也未找到它在新文明中应有的位置。

道德是崇高的字眼。然而它既不是历史的起点,也不是历史的终点。它不是历史的主宰而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它只有保持与历史的整体同步前进,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要求历史的运行都合乎道德,其结果只能使一切都变为不道德。

十年浩劫之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成为了摧毁宗法专制和人身依附精神樊笼的第一次理论冲击波。但从实质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它是用一种进步的理性化道德史观去批判和取代陈腐愚昧的道德史观。它比较容易被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却未促成历史心态的根本转变。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进步所抱有的人类童年的天真,积淀成了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了我们今天改革和开放的沉重包袱。庆幸的是,社会震荡所引起的惶惑和骚动,终于使这种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心态浮现出来了。我们有可能通过自省

和反思，把它从我们对改革和民族文化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中剥离出来。反过来，人们对这种深层历史心态的深掘和剖析，也将疏导社会的各种惶惑和骚动。

三、在历史的选择中重建

在十年的改革和开放中，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最重要变化是什么？这就是从无选择的传统文化格局向有选择的多元文化格局的渐变。对民族而言，这是重要和可贵的进步。对个人而言，它却意味着新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的重建。这是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是个体行为约束模式的转换，是重构民族道德的重要契机。

无选择文化即社会价值取向的单维化和个体对群体的绝对屈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都是以行政权力为单一轴心，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省、县、乡、村社等等）工农兵学商合一的组织和控制。在这个以最高政治权力为文化引力中心的多层次同心圆系统中，每一层次都有被确认特权和利益的小国之君。而这一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民兵）、司法、教育、卫生、商业、服务、基建、住房和运输等无不在其权力控制之列。一个人的生死、爱情、信仰、谋生、社会地位和命运都与这些小国之君息息相关。那些为百姓作出较好选择者则被推崇为明君英主和父母官。百姓个体的选择几乎被约简为零。无选择文化格局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亦非一党一派之所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它发展得越充分和完善，社会官僚结构就越臃肿，行政黑洞就越大。在传统的文化格局中，不仅芸芸众生的选择功能被取代，而且那些擅权居位习惯于“为民作主”的选择者，则往往失去了人的自然情感和心理素质。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却因成为某种群体的人格化身而最终丧失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选择特性。

传统的道德史观则为这种无选择的格局提供了精巧的精神装饰和合理性辩护。为了维护君臣父子宗法结构的政治稳定，它通过对人欲的剿灭不仅把多层次的人生选择变成了唯一的道德进取，并且也规定了这种进取的途径，使人生境遇和地位的改变听命于宗法名分关系的自然递进（即论资排辈），以世代相沿而习来保持群体的和谐。这种无选择的选择使国人既不愿主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允许别人去改变命运。任何人对人生价值的多元选择，对自身境况的逾越，都被视为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挑战，对他人的蔑视和群体的冒犯。随后各种以“道德名义”进行的讨伐，各种以群体方式的兴师问罪，各种私下的刁难、人身攻击和流言蜚语等飞灾横祸便劈头盖脑而来。直至僭越者默认自己的狂妄，立意迎合阿附为止。这也是国人心中的最大“公道”。从商周礼制思想体系的形成至今，传统道德史观及其蕃息的历史心态，为封建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提供了有力的杠杆，象梦魇一般抑制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无选择的格局与道德史观的互补机制，成为了多年来党内“左”的东西猖獗成灾的社会文化根源。一方面左的东西可以依托无选择的格局，压制和迫害持有异议者，通过剥夺后者的基本生存权利来迫其就范。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正襟危坐地进行抽象原则和空洞口号的布道，把自己种种虐待狂和迫害冲动，归结为教人从善和忏悔的至诚。以至搞出荒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草苗之辩”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已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其发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竟毫无反思，这到底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宽容还是对历史的麻木？

改革和开放的最大成就就是冲破了无选择的传统文化格局，把选择逐步还给民众，使民族逐步接受着历史进步多元价值选择的时代意识。农村经济政策中的一连串“允许”和“可以”，以及发展商品经济，搞活企业促进竞争等等，其文化学意义就是把选择还给人自身，创立一

种“机会”的新文化和完善社会生活的激活机制，尽可能地开拓和充分利用社会发展的自由空间。然而，我们的民族尚未自觉根除无选择文化所铸造的精神枷锁——道德史观及其历史心态。它们的故态复萌将随时试图把新的文化格局诱回传统的囚笼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生产力标准讨论的使命不是重申或完善一个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原理，而是要彻底地把人们从传统历史心态和道德史观的压抑中解放出来，重建社会的合理价值选择机制，有力地促进一种有较高选择度的文化新格局的形成。这也是我们重建民族道德的现实基础。

新的文化格局需要一种新的凝聚力。它不仅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的撷精采萃。更重要的是来自民族对未来文明的共识，来自对现代文明多元价值选择特征的透析。现代文明具有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开放的组织结构。前者决定了现代人际关系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层次。人与世界的意义关系或价值选择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后者则要求社会制约机制必须从传统的被动控制转换为主动激活的新模式，注重通过提高社会需求与文明进步，个体生存与群体发展之间的张力来获致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与人道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面旗帜，不是异化人性的复归而是人对自身境况的选择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的不断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是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价值取向的建构和实现。它有希望把中国人历史心态的提升与民族现代化的大业统一起来，激发出强大的文化内聚力和进取精神。它应当在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民族道德的重构既需要摒弃道德一元的文化价值选择模式，承认各种文明共同体内多元价值尺度存在的合理性，又需要在公平意识和法律认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行为的制约机制；客观区分道德规范与道德理想，根除权威主义和楷模文化的人伦制约模式；在历史的具体中调整群体与个体间的双向制约关系，把人的道德进取和自省建立在人对权利和责任的自我确认和选择之上，使道德主体不再为成为群体道德楷模而进行自我修炼，也不再会因群体制约的缓解而道德放纵。从传统道德格局的紊乱到新道德的确立，是一个由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这种转化的契机（涨落）就是利用生产力标准讨论展开对道德史观的深入批判，并通过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加以巩固。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并且最初它必不如我们的先人用道德建构历史观那样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时空的差异，而是因为这将面对文化巨大的惰力。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不再是现代文明激流中的文化孤岛，尽管总有人希望将她禁锢在古老而封闭的文化地层，把中国变成那些闪动着惊异和怜悯目光的文化游客们流连往返的超级文化博物馆。

为道德史观送旧的丧钟已敲响，这就是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它会勾起生离死别的感伤和怅惘。“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的难受，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注释：

① 《礼记·冠义》

②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第55页。